

·特稿·

# 中美教育交流：以复旦早期校史为例

[加]许美德<sup>1</sup> 著,钱益民<sup>2</sup> 译

(1.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安大略教育研究院; 2.复旦大学 校史研究室,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以李登辉和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和实践为基础,比较复旦与北大精神气质的差异及表现,进而比较美国和欧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结论指出,中国和美国在认识论方面可以协调一致,架起文明对话中的沟通之桥。

**关键词** 李登辉,复旦,精神气质,中美教育交流,文明对话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059(2005)05-0024-09

## Sino-American Educational Interaction from the Microcosm of Fudan's Early Years

Ruth Hayhoe<sup>1</sup>, QIAN Yi-min<sup>2</sup>

(1.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2.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Fudan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Fuda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Li Denghui provides a striking contrast to that of Peking University, with an ethos profoundly affected by American values of scholarship. We see the same set of contrasting influences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in national level polic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ynergi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epistemology that have been evident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at may well flower into new forms of collaboration at present as well a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i Denghui, Fudan, ethos, Sino-American Educational Interaction,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引言** 为什么集中讨论复旦?

本文以复旦早期校史为个案,讨论中美两国教育间的相互交流。复旦奠基人李登辉出生于华侨家庭,189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除复旦外,虽然中国也有许多其他大学深受美国模式的影响,但它们大多是教会大学,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管理权掌握在美国相关机构手中。而复旦是一所爱国的高等学校,它由中国著名的天主教学者马相伯所创建。透过复旦这个微观的个案,我们可以看清中美两国不同认识论的互动,深入理解两国关于大学的社会作用的不同观点。

在民国早期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试图清晰地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取向的选择,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是一个可资比较研究的例子,它呈现了中国和德国在认识方法和态度、在大学的社会作用方面紧密的联系。有趣的是,虽然蔡元培和李登辉在学术背景和大学的领导方法上迥然不同,但两

人都是马相伯的追随者。19世纪70年代,马相伯在上海接受了法国和意大利耶稣会的教育,曾数度出国游历考察,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对中国的政治、宗教和学术事业都作出了贡献。<sup>[1]</sup>

本文开头概述马相伯早年为中国创建一所新式大学的设想。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使其成为一所有高度影响力的全国性示范高校,这正是实现了马相伯的某些设想。接着,本文转向李登辉的故事,讲述他在耶鲁接受的教育,1905年他决定受马相伯之邀出任复旦公学教务长。复旦从1905年创建到二战胜利的1945年之间,精神气质上受到美国学术价值观的显著影响,与北京大学的气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差别是多方面的,表现在学校的课程选择上,表现在学生和全体教师的作用上,也表现在教师对待思想自由的态度和方法上。文中提到了20世纪30年代复旦发生的一场讨论,比较了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本文最后

以若干深入的思考结尾,结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和美国在认识态度和方法的诸多方面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它可以融入今天和未来新的合作形式中。

#### 北京大学与欧洲的影响

为了办一所“与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的新式中国大学”,<sup>[2]</sup>马相伯于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他给新生的学院制定了三条方针——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sup>[3]</sup>。马相伯制定的课程反映了他的办学方针,所有课程分为文学和质学两类,文学类课程主要是拉丁文和希腊文、法文和英文、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心理学。文学类附课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社会和国际公法。质学类课程也包括一系列核心课程和若干门附课<sup>[4]</sup>。耶稣会的教育对马相伯影响至深,但他却没有把神学和宗教纳入课程中。相反,马相伯强调基础学科的知识对培养智力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中国的青年学生应该掌握欧洲的古典语言,藉此对潮水般涌入中国的新学有基本的了解。

蔡元培是马相伯早期的学生之一,此后又在德国和法国呆了很长时间,深受德法两国大学传统的影响。1917年,蔡元培在第二次游历欧洲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目标:抱定宗旨,研究高深学术;砥砺德行,以身作则。<sup>[5]</sup>为了捍卫大学自治,使北京大学从军阀政府掌控中独立出来,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也反对大学教授同时在政府任职<sup>[6]</sup>。除大学自治外,蔡元培捍卫的另一个核心价值观是学术自由,在他看来,学术自由是与德国大学传统相关的一个概念——康德主张,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要分开,教授的职责是推动一门特定学科的知识<sup>[7]</sup>。所谓学术自由,只存在于各类学科知识对纯理论问题进行自由探讨这一情境中,而与师生们直接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毫无关联。

毫无疑问,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运动中所有起转折作用的行动都是在北大酝酿的。如果没有蔡元培开办的种种有利条件,人们很难想象这场运动会发生。通过聘任一支由诸多不同背景、不同政治立场的教授组成的教师队伍,吸引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蔡元培营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重镇<sup>[8]</sup>。但是人们很少注意运动中的其他方面,关注蔡元培在面对运动时极度矛盾的心态和行为。当事件扩大,突然转变成直接的政治活动,许多学生和教师被当局逮捕时,蔡元培陷入极度不安。他竭尽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并以辞去校长职务来请求学生们脱离政治活动:“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sup>[9]</sup>

北大课程的设置方式也同样表明,蔡元培哲学上受到严格二元论的影响是多么深刻。德国的大学注重纯粹的文科和理科,实用性的工科和商科单独设立工程大学,不包括在大学之内。受此德国大学模式影响,他将原有的工科迁出北大,与天津的北洋大学合并<sup>[10]</sup>。他还试图将法科脱离北大,独立成立学院,但没有成功。在蔡元培看来,法科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官僚化取向——学者以当官从政为圭臬——的侵蚀,

因此要从大学中脱离开去。

#### 李登辉与耶鲁大学

1905年,李登辉应马相伯之邀,出任新创建的复旦公学教务长。当时,马相伯正在寻找一位具有领袖潜力和富有真正奉献精神接班人,希望他来培育一种适合中国需要的大学精神。马相伯决心与耶稣会士决裂,脱离震旦学院、创办一所崭新的高等学校——复旦,其主要原因在于马相伯和耶稣会间的三方面冲突——课程设置上,耶稣会欲强制校方采用法国模式;校务管理上,耶稣会坚持从上到下由教会对学校实行严格的控制,而马相伯主张学生自治,学生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招收学生方面,除青年学生外,马相伯也欢迎富有政治经验的成年人入学,而耶稣会只想招收可塑性强的青年学生<sup>[11]</sup>。虽然马相伯信奉天主教,倾向欧洲的学术模式,但是,他信任接受美国式教育的基督教新教徒李登辉,坚信他是实现自己抱负的理想人选。

李登辉1872年出生于爪哇岛一个富裕的布商家庭。1886年前往新加坡一所英文学校求学。五年后他到了美国,先入威斯雷阳大学,1895年(应为1897年——译者注)转入耶鲁,1899年获文学士学位<sup>[12]</sup>。

李登辉求学时代的耶鲁,人们称之为“一所法律许可的大学,职业性学院日渐发展,但本质上依然是一所伟大的学院,大学只是它的附属物。”<sup>[13]</sup>在诺亚·波特(Noah Porter, 1871-1886)和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 1886-1899)两位基督教牧师的领导下,耶鲁成功地抵制了把大学作为首要特征,或把研究生教育放在首位的趋势,拒绝实行选修课制度。坚持为所有的本科生实施通识教育,保证本科生在希腊、拉丁文经典著作和数学方面有良好的基础,是这种立场的鲜明表现。在通识教育基础上,再增加各种科学课程、社会课程和艺术课程。耶鲁的课程逐渐有所调整,但选修课制度相对较晚才得以实施<sup>[14]</sup>。

学院的氛围是通过班级系统来维系的。在班级系统内,每一年的学生之间相互建立起密切的学缘关系<sup>[15]</sup>。主体是耶鲁人组成的全体教师,他们营造出一种强烈的、牢不可破的协作精神。同时,地理上的孤立状态也造成学院内部强有力的同质性。波特校长和德怀特校长均亲自委身本科生教育,开设诸如宗教学和道德哲学之类的课程。波特校长以开设的课程——“基督教的见证”而闻名遐迩,在他去世的1892年,这门课才从全校学生的必修课中删去<sup>[16]</sup>。研究大学史的学者乔治·威尔逊·皮尔逊(George Wilson Pierson)在他探讨1871-1921年之间耶鲁学院的著作中,以哈佛大学哲学讲座教授乔治·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参观耶鲁的故事开头。桑塔耶那觉察到,“耶鲁有一种宗教”,因此,“解决最重大难题的办法,不是探索……问题的答案早就找到了。”<sup>[17]</sup>与耶鲁形成鲜明的对照,哈佛的特征却是“对启蒙的忠诚”<sup>[18]</sup>。

无须再进一步区分大学气质和学院气质的差别,其实我们已经隐约提到了。显然,李登辉19世纪90年代在耶鲁所受的教育,精神气质上主要是学院式的,虽然那时欧洲的大

学模式正在开始改变美国其他的大学。那么,学院模式的特征是什么?它表现在很多方面:极其强调道德和智识的不可分割性,一种对本地的责任感,一种服务精神,以及为了知识的整体性而对专业化、职业化的抵制,在课程上采用一种通识课程。知识,是为了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求知本身的目的只是次一位的。从认识论看,知识的进步,更多地是通过实用主义的方式,而不是像欧洲高深学问那样,通过理性主义的认知方式。

李登辉在中国面临的工作环境,与 19 世纪晚期的美国有天壤之别。因此,他把学院模式应用到上海,来培育一所新的私立大学,这种创造性工作的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的了不起的成就。很自然地,在李登辉领导复旦的某些方面,我们能够看到耶鲁精神在起作用。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李登辉极其强调学生品德的培养。他在很多场合赞助基督教事业,包括担任中国基督教教育协会董事、东吴大学董事<sup>[19]</sup>,但他从不允许在复旦课堂上传播基督教。在同事和学生眼中,他在课堂上是位严师,在课堂外则不拘礼节、和蔼可亲,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一位基督徒的献身精神。<sup>[20]</sup>

人们可能会问,李登辉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耶鲁德怀特校长的影响?作为耶鲁著名的通识课程的一部分,李登辉一定聆听过德怀特校长的讲课。在李登辉担任复旦校长期间,曾先后开设了伦理学、哲学、心理学、英语和法语等课程。为了教授英语,他还编写了英文教科书,十分畅销。虽然他没有受过正规的中国语言和文学教育,但他理解中国语言和文学在一所中国大学中的重要性。通过不懈学习,他学会了说官话和上海话,他也掌握了足够的汉字,来审订所有以他名义出版的翻译课本。他用中文书写的“李登辉”三字字迹工整娟秀,在《复旦周刊》中连续刊登了多年。当然,在教学和管理中他还是以英文为主要交流工具<sup>[21]</sup>。

#### 复旦大学与美国的影响

1905 年马相伯缘何邀请李登辉?人们可能会说,是李登辉在耶鲁学习的希腊文、拉丁文,因为后两者正是马相伯看重的。然而,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李登辉曾在复旦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材料。在李登辉领导下,复旦沿着实用主义办学取向发展。上海当地的政府官员广泛参与校务,提供学校经费,有些甚至担负起教学和其他责任。马相伯培养学生深入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培养初衷,被为了获取上海职场的入场券而注目外语和实用学科的实用主义兴趣所取代。

辛亥革命使复旦陷入动荡,吴淞校舍被军队占据,南京临时政府首脑指令拨徐家汇李公祠为校舍,复旦得以重建,成为一所私立高等学校。马相伯在帮助复旦获得李公祠后,马上前往北京任职。1913 年李登辉被校董会任命为复旦校长,此后长期在复旦任职。1913 年起草的复旦章程,根据《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提出了“研求学术,造就专科人才”的宗旨。<sup>[22]</sup>章程制定的详细课程包括三年制的中学教育和另外三年的大学预科教育<sup>[23]</sup>。课程涵盖数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人类学、几何学、哲学等,范围如此广泛的课程如果与耶鲁的课程作比较,将是十分有趣的。中文和英文是主要的

语言课程,复旦还开设了德语和法语两门选修课,大学预科生在最后一年还可以选修拉丁语。章程为大学预科的最后一年制定了选修课,为毕业生们进入大学专业领域的学习作好准备,预科毕业生如不继续升大学,这些选修课则为预科三年级学生的普通必修课。我们同样会提问,这是否也受到了耶鲁的影响。

李登辉担任校长以后不断提高复旦的品质,1917 年终于把复旦升格为大学,但是继续招收大学预科生。为了购买校园基地,在江湾实现建设新校的宏伟计划,李登辉扩大募捐范围,前往东南亚募集建设资金。1920 年和 1930 年的《中国年鉴》记载,根据基建和设备分析,复旦是国内当时获得资助最多的私立大学之一,这一切都是李登辉积极努力的成果<sup>[24]</sup>。

李登辉建设复旦的理想,既表现在他聘任的教师队伍中,也表现在他制定的课程中,而最明显地表现,则是他对学生和教师参与政府服务、政治活动和社会事业的态度和对策。李登辉与蔡元培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方法和态度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将在下文证明,这些不同的原因是,李登辉受到了美国大学模式的启发,而蔡元培的大学理想则是建立在欧洲大学模式之上的,这两种模式各有认识论基础,也就是实用主义和严格的二元论。

#### 复旦课程的演变

从李登辉担任校长的第一年 1913 年,到复旦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案的 1928 年,复旦的课程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文已提到,1913 年章程制定的中学和大学预科课程,包括文科和理科两部分,覆盖面很广,又不失综合性。1917 年新增了一个商业课程计划,反映出当时上海雇佣市场的需求,李登辉聘请了在经济领域建树颇多的著名经济学家李权时<sup>[25]</sup>。在郭任远领导下,1923 年又制定了心理学系发展计划。郭任远是一位杰出的实验主义心理学家,在留美期间已经饮誉美国<sup>[26]</sup>。1922 年,应学生要求重视实用性科学和工程的呼吁,理科新增了土木工程系<sup>[27]</sup>。20 年代另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是法律、政治和市政。李登辉请来了中国法学权威王宠惠,王也出生耶鲁,并一度出任复旦副校长,后担任复旦校董会主席。李登辉还吸引了出生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家张志让、从哈佛大学归来的政治学家孙寒冰<sup>[28]</sup>。

复旦是中国最早创设新闻教育的大学之一。五四运动后,陈望道从浙江第一师范来复旦任教,邵力子等新闻巨子与复旦也渊源颇深。1928 年复旦在国民政府成功立案后,新闻学系与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学系、教育学系、社会学系组成了文学院。心理学系后隶属于生物学系,与化学系、土木工程学系组成理学院。法学院下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和市政学系。商学院设有银行学系、会计学系、国际贸易学系、工商管理学系。课程覆盖面既广,实用性又强,适应了上海职业需求和商业发展需要<sup>[29]</sup>。与此相反,蔡元培侧重纯粹的文科和理科,裁去北大的工科,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法科,因为它有滋生教育为官僚主义服务的不良倾向。

#### 教师与学生

聘任教师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处理师生参与政治活动?李登辉和蔡元培在这两个敏感问题上既有相同之处,更存在



显著的差异。循学术自由之原则,蔡元培有意任命了数位第一流的学者,他们学派各异,社会和政治观点截然不同,在德国学术自由的理路下,蔡元培允许他们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北大地处北京,由于它的独特地位,蔡元培能请到当时全国最杰出的学者是不足为奇的,由此催生的学术繁荣和社会大变革,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但是,蔡元培坚持认为,大学教授是不能同时在政府部门任公职的<sup>[30]</sup>,因为这将永远延续中国的负面传统,即学者出身的政客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企图操纵大学。直到抗战爆发,他领导全国教育的一贯目标是,大学独立,进而整个教育从民族主义的政治中独立<sup>[31]</sup>。

下面来看蔡元培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态度。当一场文化运动和文学启蒙运动转变成一场反对军阀政府的紧张斗争时,蔡元培内心陷入矛盾之中。他关心和支持学生,但是坚决不同意他们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并以辞去北大校长来表明大学独立于政治的重要性。

在聘任教师和对师生参与政治活动两方面,李登辉的观点和立场都不一样。他接纳因介入政治活动而遭嫉恨、被政府和教会大学驱逐的师生,欢迎他们到复旦任教或求学,这是他最为人称道的地方。日后担任复旦校长的章益,动情地描述了李登辉向他敞开复旦之门的故事。因参加五四运动,章益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就被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开除,没有毕业证书,一般学校是不允许入学的。其他许多能干的学生也像章益一样转学到复旦<sup>[32]</sup>。五四期间,李登辉延聘了两位著名左翼活动家陈望道、刘大白,他们都是被政府控制的浙江第一师范驱逐的。他还把国民党的几个知名人物请到复旦,包括日后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于右任、邵力子和胡汉民。他们不时来校演讲,政治上给复旦必要的支持。其他多位国民党要人则出任校董,帮助复旦募集资金。

由于和知名政治人物存在广泛的联系,复旦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心。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迁到远离首都的昆明,复旦迁到重庆北碚,就在重庆市的长江下游,校园内的政治斗争进一步升温。《文摘》杂志是复旦人最引以为荣的成果,杂志把世界各地大量政治和社会评论译成中文,使中国读者得以深入了解许多国共两党的出版物中所没有的信息<sup>[33]</sup>。

李登辉从一开始就对师生投身政治活动抱支持态度。五四运动中他给学生的有力支持就是显证。1919 年 5 月 6 日清晨,邵力子把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消息带到复旦校园,当天学生四处分散全市做动员,成为上海五四运动的先锋队。结果,复旦学生掌握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权。复旦要在运动中起适当的作用,这一点李登辉没有丝毫犹豫,事实上,他设法利用这场运动来吸引优秀的学生和教员,为复旦赢得了爱国高等学府的名誉。

复旦课程发展演变主要考虑的是与社会和政治的关联。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要通过实践来促进知识的发展,适当地社会的需要。以教育系为例,它热衷教育实验,与复旦实验中学和为当地儿童服务的义务小学有密切的联系。经济系是另一个例子,复旦早期著名的教授薛仙舟,是中国合作运动的倡导者。在他影响下,复旦创设了合作银行、合作商店和其

他机构,以实现发展经济的目标<sup>[34]</sup>。

在课程设置方面,以及对师生直接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态度上,李登辉和蔡元培都完全不同,其根本在于两者认识论上的差异。蔡元培深受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欧洲理性主义的影响,主张事实和价值的二元对立,强调通过逻辑证明和科学实验推进纯粹的理论知识。李登辉和蔡元培都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都献身于道德教育。但是李登辉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影响,没有蔡元培学术立场上的二元论和纯理论的理性主义。

下文引自 1926 年李登辉的一篇文章,表明了一种极其强调道德的基督教徒的实用主义认识论:“知识本身并非终极目的,也不是提高人的地位、激发人类物欲的手段……知识带领我们走向真理之路,使我们避免错误,伤害人类的真正利益……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使人道德完善,道德完善与否是衡量一个人取得真正成功的尺度……自然的法则秩序的法则是秩序的法则是秩序法则的精神表现。任何打破这个法则或不道德的人,都无法逃避它的惩罚。”<sup>[35]</sup>

#### 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

蔡元培和李登辉都秉承自由探索的理念,大学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可以探索任何课题,无论他们相互之间多么分歧。两人的区别在于各自不同的认识论,蔡元培的认识论特点可以归结为基于欧洲理念之上的“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李登辉信奉的则是“思想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这个观念更加适合美国的实用主义和中国传统的知识观。

在一个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蔡元培解释了他的“学术自由”观,强调了两点:“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他接着说,“教授的主要职责是学业,他们在大学讲课的唯一限制是不违背第一条原则。”<sup>[36]</sup>蔡元培说得很明确,他倡导的学术自由和教授们在自己专门领域内自由表达任何见解或提出任何观点的权力息息相关。他接着说,教授们就政治发表的观点和采取的行为,比如北大教授支持满清皇帝复辟,这纯粹是他们的私事,大学无须过问。在这种学术自由观的支配下,蔡元培强调发展北大有关纯粹知识的学科,要求师生不要介入政治活动,自觉抵制官僚对学校的渗透,通过长期的研究推动知识的发展。与学术自由相关联的另一个概念是自治,中文表述为“教授治校”。大学评议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对政府采取超然独立的立场,指引大学学术,教育青年学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除大学评议会外,北大没有其他校外的管理机构。

在上海查阅的所有复旦早期档案材料中,我从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学术自由的讨论,而这是蔡元培在北大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了寻求支持,李登辉聘请国民党要员和上海工商巨子,不失时机地建立起复旦校董会,国民党内数位著名人物担任了复旦教授,教授队伍中还有著名的左派人士如陈望道、刘大白和孙寒冰。不言而喻,教授和学生们认为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是正当的,并且寻求学校对他们的支持。因此,政治斗争在复旦校园公开化了,并且日趋白热化。1936 年国民党当局决定牢牢掌控复旦,这直接导致了李登辉的辞职<sup>[37]</sup>。抗

战时期复旦在北碚,尽管和国民政府首都近在咫尺,复旦还是继续成为斗争的中心<sup>[38]</sup>。

刘大白作词的复旦校歌,表达了思想自由的精神:“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sup>[39]</sup>1932 年 10 月,《复旦大学校刊》就学术精神展开讨论,从各方论点看,欧洲的学术理念几乎没有影响复旦。宣传者试图劝说学生脱离直接的政治活动,此前,复旦学生成功地领导了反对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斗争,1932 年 1 月复旦学生军又成功地击退了日本的进攻。这位宣传者从柏拉图学园追溯了“学术”这一术语,批评中国高等教育缺少真正的学术精神,师生经常参与政治活动就是证明<sup>[40]</sup>。学生们视这篇文章为打着学术自由观念替国民政府压制学生运动辩护,在后一期《复旦大学校刊》中,两名学生对此进行了激烈地反击。他们在文章中支持学生参与政治斗争,因为这是阻止政府屈从日本要求的唯一办法,指出“牛(津)(剑)桥精神”适合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适合中国需要<sup>[41]</sup>。

问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追求一种基础至为广泛、心怀天下的思想自由,无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还是领域外,都有权提出任何问题,他们有关关注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的道义感。李登辉校长高举的正是这个思想自由的概念,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接近。这是李登辉 19 世纪 90 年代在耶鲁接受教育时种下的,它与蔡元培稍后在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接受的学术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的语境中,如果说思想自由是一个颇有争议而且难以实现理想,同样,在美国高等教育界,思想自由也是一个迟到的概念。事实上,这个概念是在大学时代才出现的,而不是出现在此前的学院时代。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在 1915 年原则宣言中首次提出思想自由的提案,宣言提出了通过解决问题来推动知识进步的设想,以及坚持参与社会和政治事业的自由:“我们不希望,学者们被排除在大学外部有争议的问题之外,他们有权对大学外的问题发表观点;我们不希望,学者们言论的自由仅仅局限于他们自己专业内部。如果为了公共的利益,我们排除学者们支持有组织的运动,那是不对的。”<sup>[42]</sup>正是在这一点上,李、蔡关于自由探讨的观念产生了分歧。

霍夫塔德(Hofstadter)和麦格特(Metzger)的经典著作《美国学术自由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了同样在民主政治的环境下,欧洲学术自由观念在美国高等教育扎根较晚的原因。他们强调了哲学上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强调了美国大学教育中坚持的学院精神,后者致力于服务本地社会,并对教会、政治家和商业领袖组成的地方董事会负责。因此,在推动纯粹的知识之外,美国大学还有为社会服务的更高目标<sup>[43]</sup>。

复旦早期校史发展之路,以迷人的方式演示了美国的学院气质——李登辉就读的耶鲁学院有异常充分的表现——与一种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结合,它是在 20 世纪上半期动荡年代里的复旦完成的。

美国与欧洲在高等教育政策上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李登辉影响下的复旦,扩大到 1911 年至中日战争爆发的 1937 年这一更为广阔的高等教育政策图景下,那么我们看到,欧洲和美国对中华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同样是显著的。随着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各级各类学校令于 1912 年出台,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sup>[44]</sup>,1913 年的《复旦公学章程》规定的人才培养宗旨与后者是吻合的。大学由全体教授组成评议会,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专门学校直接由管理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各政府机构管辖。

但是,蔡元培直到从欧洲回国后 1917 年到 1923 年执掌北大,他建设中国现代大学理念才得以实施。我在上文已经指出,蔡元培诠释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方法,他遵循德国模式,主张高等教育分两个系统,为数不多的大学推动纯粹的文科和理科学术的进步,大量的则是专业化的专门学校。

蔡元培异常关注学术和教育对政治的独立,德国哲学的影响使他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道德原则——以理性为基础,与美感相结合,并超越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试图建立新的机构,防止政治势力干预大学和教育系统。受法国模式的影响,他建议政府设立一个全国大学院,享有高度自治,领导全国的大学 and 所有学校,使学校免受政治的操纵<sup>[45]</sup>。他还努力抵制国民党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各级学生联合会<sup>[46]</sup>。蔡元培最终没能劝说政府学习法国实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度。于是他退而求其次,转向建立中央研究院,作为现代中国的学术仲裁机构和学术指导机关。这一点受到了法兰西科学院模式的影响,其中包括他导师马相伯的影响——早在 1913 年马相伯就试图建立函夏考文苑<sup>[47]</sup>。

受美国教育模式影响下通过的 1922 年和 1924 年教育法规,继续冲击着中国教育界。受其影响,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别在缩小,所有高等学校的学制延长到四至六年,统称为大学<sup>[48]</sup>。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需要的实用主义意图,取代了正式制定的教育目标:“适应社会进步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留地方伸余地。”<sup>[49]</sup>

高等学校的数量由 1917 年的 8 所,猛增到 1923 年的 35 所,这些学校都自称是大学。数量上的变化表明,这种更加宽泛和不拘一格的大学模式在中国土地上扎下了根<sup>[50]</sup>。新法规还有其他两个改革,第一,课程组织上实施选课制度<sup>[51]</sup>,第二,建议所有大学建立一个负责预算和其他重大发展问题的董事会<sup>[52]</sup>。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特征正是复旦早期组织机构的特点,1928 年以后更成为保证中国人控制在华教会大学的便利机制。这些特点在国立大学中是不多见的。

美国和欧洲的教育模式,谁更适合中国教育发展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这个讨论再次成为焦点。1929 年 4 月,新的高等教育法规通过,同年 7 月作了修订。前者制定的高等教育目标是:“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陶冶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sup>[53]</sup>后者修订为大学负责“研究高深学术”,重申了专门学校“训练技术人才”的目标<sup>[54]</sup>。新法规关注大学



课程广度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职业性学科和基础文理科学相结合的重要性。大学至少要有三个学院,其中之一必须是理学院或农、工、医学院之一。<sup>[55]</sup>南京政府主要强调的是,从实用角度出发,发展实用知识,适应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人们很可能认为,南京政府将受到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强烈影响,因为大批领袖人物、许多大学掌权人和教授是从美国回来的,而且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关系十分密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31 年,四位欧洲著名学者应邀来华,在国际联盟学术合作学院赞助下,从小学到大学,对中国教育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考察,提出了改革建议。他们表达了对中国教育过度受美国影响的担忧:“对此值得注意的事件,人们应该引起特别重视。不用说,美国模式对中国教育产生了过分的影响,后果令人担忧……这些评论的目的,只是警告中国教育家们要反对中国教育表面的美国化。与其如此,不如采用一种原创精神,凭借这种精神,美国已经成功使欧洲文化适应了本土的环境。”<sup>[56]</sup>他们还说,“欧洲文化比美国文化更适合中国的需要,因为确切地说,美国文明是在毫无本地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欧洲,像中国文明一样,必须时刻考虑已经延续数千年的传统……”<sup>[57]</sup>。

大学管理方面,考察团建议设立一个大学评议会,就高等教育地区分布的合理性以及各类学校重新设计课程以适合国家和地区发展提出建议。考察团建议加强大学基础学科,建立类似欧洲的讲座教授制度。还建议采取统一的入学考试,保证全国的生源水平相当,毕业前采取毕业统考,确保毕业生达到各自专业领域的标准。他们认为,美国影响下的学分制度,学生学习积累学分,只能导致知识完整性的分裂。

他们有些建议被采纳了,但调查团的建议并非像蔡元培的思想和行动所清晰表明的那样,是建立在真正理解欧洲学术和教育观念基础之上的。调查团成员推荐的欧洲模式,适合中央集权和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在战争日益逼近的环境下,国民政府借此来发动战争,扩大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当然,建议的许多方面还是提高了大学教育的水准,加强了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应用科学,但他们同样也是压制知识分子和消灭政治分歧的有效工具。国际学术合作委员会委员、西班牙学者乔西·卡斯特罗(Jose Castillejo)对这份调查报告发表了评论,他清晰地预见到一种可能性:“中国政府应该警惕一种危机,即所谓推动教育与和平事业的进步,可能是采纳一种不成熟的、言过其实的、僵硬划一的中央集权系统的结果,这样往往把国家的教育事业捏在刚刚成立的官僚政府机构手中。”<sup>[58]</sup>

时任国际教育协会主席的史蒂芬·杜根(Stephen Duggan)对调查报告的批评反映了美国人的意见:“中国在决定自己国家的目标时,谈论自己与欧洲传统文明的相似性,这是否有价值?不要说封建时代的学院残余充斥欧洲,阻碍大学的改革和进步,而且许多欧洲的传统与封建精神令人沮丧地结合在一起,与 20 世纪的时代精神很不协调……如果中国要在 20 世纪生存下去,她必须调整自己的大学和文化传统,使其符合变动不居的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现代文明建立在科学概念和技术设备之上……”<sup>[59]</sup>

1938 年至 1940 年间,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课程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各主要科目都建立起委员会,制定了必修课程标准。新的教科书突出强调中国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科学等有关国情的科目。评价教师也有了标准,精心设计的教师考核程序建立起来<sup>[60]</sup>。但是,考虑到混乱和破坏这些政府必须处理的困难局面,考虑到主要的大学为了躲避日本侵略不断内迁,上述措施对抗战时期实际的高等教育影响很小。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出现了新的高等教育模式,新建的高校在战争中快速适应了环境。战争中大学的自治程度,往往与距离战时陪都重庆的远近有关。

为适应战时之需,各大学纷纷调整课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给师生以支持,与中国本土社会和工业环境密切相关的教学研究内容日益得到重视,一反此前对欧美课程的过分依赖。地处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的西南联大,可能是国人最感自豪的学府。最近出版的约翰·依斯莱(John Israel)的著作《联大:一所战争和革命中的中国大学》(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对这所大学作了全面、深入地研究,介绍了它的文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教育、师范教育,还介绍了联大杰出的教师群体,他们在自然科学、历史、文学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术声誉至今仍令中国人自豪<sup>[61]</sup>。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西南联大体现了思想自由、大学的社会责任感两个核心价值观,后者由多种因素构成,其中包括中国书院和美国的影响,美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清华,或多或少也体现在早年的南开<sup>[62]</sup>。当然,欧洲传统也融入了这所有创造力的大学,但不是很明显。即使北大,在蔡元培领导下曾如此深刻地受到欧洲学术价值观的影响,抗战后胡适担任校长期间,大学课程也逐渐向美国模式靠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只是在共产主义革命以后,欧洲模式才相当彻底地实现并得到巩固。借着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的名义,1952 年新中国对全国高等教育进行了院系大调整,高度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起来,其中包括少量的只办文理科的综合性大学(与蔡元培早期对北大的构想十分相近),部分高水平的理工科大学,如清华、浙大,大部分则是高度专门化的学院,受中央各专门部委的管辖。这种理论与应用知识的分裂,以及高度专门化的取向是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背道而驰的,也违背了主张各门类知识有机融合的中国传统。从文化角度看,大跃进中对苏联模式的抛弃以及文革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从根本上分析,这可能与中国和欧洲之间认识观上的不协调有关,更明显的原因当然是中苏间政治的分歧<sup>[63]</sup>。

自 1978 年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从国际交流和各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中获益匪浅。许多部门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巨额投资<sup>[64]</sup>。许多国家都在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欧洲国家、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内。当然美国模式影响最大、最直接,因为美国高等教育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影响日本,六七十年代开始影响欧洲<sup>[65]</sup>,已经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全球高等教育模式。当我们审视蔡元培和李登辉分别领导的北大和复旦时,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把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一分为二,划出一道清晰的界线,现在,

这个界限明显消失了。中美近 25 年来的教育交流,已经从美国实用主义和中国哲学传统的潜在调和中获益,这种内在的和谐在 20 世纪 20 年代已经很明显了。

#### 结论:中国、美国及其与不同文明的对话

随着 1991 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倡导不同文明间对话的论调出现了。持论者希望,建立在启蒙运动价值观基础上的西方大学,向新思想敞开胸怀,得到中国、印度等东方源源流长的高深学问的启发<sup>[66]</sup>。对话意图不是贬低欧洲丰富的传统,而在建议输入新的哲学信息,指导我们进入全球化的未来。尽管福山(Fukuyama)提出了具有争议的观点,坚持启蒙和自由主义具有最终的优越性<sup>[67]</sup>,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历史的终点。事实上,我们正站在一个全球化启动的全新阶段。

程力(Cheng Li)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全面检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动态,特别提到,无论新实在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依然忽视了文化和知识作为一种改变全球社会有效动力的维度。而新出现的结构主义范式强调,国际社会本质上是由各种社会构成的,因此相当重视各种文化实践活动、各种行为准则和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对政治生活的冲击力。过去 25 年的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表明,中国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已经向美国教育开放。但是,我们还很少谈及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中国文化和哲学传统也正在影响美国人的观念,推而广之,还将有助于人类社会前途问题的讨论。一种论点认为,在中国和欧洲的文明对话中,美国的实用主义很可能架起一座沟通之桥。复旦早期校史特别提醒的中美文化协同作用,以及与之形成对比的中欧文化交流中出现的冲突,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预测未来。

文明对话论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杜维明,已经详尽地阐明,在处理西方社会面临的大范围难题和一系列重要问题中,儒家思想的作用日益显露,它是医治西方社会的一种微妙而有效的手段。受其影响,几位美国哲学家已经着手这个主题的研究,详细阐明了中国传统和欧洲传统中对人性、知识和社会的不同观点,他们提出,以美国实用主义为媒介,儒家思想可以进入西方社会思想的主流。上述观念预示,融合中美哲学传统,创造全球未来,是有深厚基础的。这也是一种迥异于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新实在主义的路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仍然有市场,但他也呼吁,为了西方世界的安全,西方的大学要潜心研究和理解东方文明<sup>[68]</sup>。

杜维明简要归纳了儒家观念中学习的过程和关系:

儒家之道是一种学习为人之道。在儒家精神中,为人之道是把自己置身于永不停止、永无止境的创造性的自我转化过程之中……学习通常被理解成为了自身的利益,但自我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一个孤岛),自我更是一个各种关系的中心(一条流动的河)。自我作为各种关系的中心,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而非封闭的静态的结构。因此,个体和团体的相互关系,人群和自然的和谐,以及与上天的永不停息的联系,是人类的特征和人类事业的终极价值。<sup>[69]</sup>

杜维明把儒家“学习”的图景作为一种矫正方法,纠正诸如工具理性、个人自由、自我为中心、物质至上和权利意识

之类的价值观。杜维明认为,上述启蒙主义价值观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动荡和环境问题。他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启蒙传统的重要性,而是在于提出建议,启蒙主义价值观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前景,它应该自觉地吸收儒家的价值观,克服自己天生的局限性,以此来丰富自己、推动自身的进步。

安乐哲(Roger Ames)和郝大维(David Hall)详细阐明了启蒙价值观可能吸取儒家思想的各种方法,他们认为“儒家传统中有许多资源,可以用来构建一个牢固的、可望实现的人道主义民主模式,对内向往公有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它是真实的,它可以避免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的缺陷。”<sup>[70]</sup>他们提出,西方思想的危机在于“文化结构上的相互不连贯性”<sup>[71]</sup>——社会上所有的个体都建立在康德割裂科学、伦理、美学和宗教的基础上<sup>[72]</sup>。矫正方法是公有社会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平等交流,以反对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经济和政治个人主义相联系的现代化的冲动。

安乐哲和郝大维还指出,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理论以两个明显的假设为基础:“首先,它反对任何身与心的分离。教育是包括身心的全人的发展。第二,个人(the individual)生存在互相联系的社群中。教育追求的是公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教育是有道德寓意的。”<sup>[73]</sup>他们进一步认为,杜威关于民主社会的观点和中国传统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比较相似。“和启蒙理性孤立的认识观点不同,实用主义和儒家都把个体看作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这些关系因实际交流而存在,通过实际交流而维系。”<sup>[74]</sup>与启蒙思想对人与知识的看法不同,他们在上述哲学基础上,提出了与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有差别的通向民主之路。他们积极出谋划策,为世界未来的民主寻找更加宽广的实现途径。

神学家、哲学家罗伯特·奈维勒(Robert Neville)的著作研究了各位新实用主义者(neo-pragmatism)诸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儒家思想的相同之处。他发现“文化间的解释是各自欣赏对方的价值、优点和对事物的需求以及他们的尊严和地位,这些价值的要素都是事物真实性的组成部分,实用主义无须接受任何事实与价值的分割,这种分割把事物与形式或结构相联系,或把价值与思想计划相联系……因此,实用主义理论与儒家感情中的整体意识、自然的审美意识是能产生共鸣的。”<sup>[75]</sup>

可能对将来的文明对话作出贡献,也是罗伯特·奈维勒谈得最深入的,是儒家思想中的礼。“当代儒家理论中的礼……十分适合符号学中丰富的实用主义理论,通过实用主义理论,礼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以及接受当代社会科学分析的符号形成行为相联系……在其他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因为深受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的困惑,西方的符号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在处理有争议问题的标准上是顾此失彼、甚至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把他们与当代儒学中礼的理论相结合,他们就能利用有两千多年深厚传统的儒家传统——它反映了文明与野蛮、个人和社会生活中良好的准则与不良准则的区别……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是儒家思想很可能成为社会科学的救星。”<sup>[76]</sup>

这些当代美国哲学家们的著作,打开了精神、文化、智力、科学知识和人的生活方面真正深入理解、合作的希望,帮助我们从阻止交流的思想观念中脱离出来,从新实在主义权威和过分强调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权威们的平衡中脱离出来,进入如何创造美好未来世界的对话。未来世界的文化是开放的,不同地区的文明互相交流。进入这样的对话,李登辉将感到欣慰,中美教育合作的历史也表明,这样的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当然,这样的对话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国方面,需要投入时间来重新认识深厚的儒学传统,五四运动以来儒学曾多次遭到批判和否定。而且深入理解近几十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对重新认识儒学传统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成就也是一个可资借鉴的丰富矿藏。在美国方面,需要重新评估大学作为知识机构应负的道德和精神责任,有迹象表明这种再认识已经开始。最近出版的著作如《大学道德的崩溃》(The Moral Collapse of the University)和《逃离伊甸园:美国的宗教和学术生活》(Exiles from Eden: Religion and the Academic Life in America)<sup>[7]</sup>,以及前面提到的奈维勒、安乐哲和郝大维等一些哲学家的著作就是明证。

在过去的 25 年中,中美双方学者和学生们已经在日常任务中相互学习、相互合作。这座跨越太平洋的沟通智慧之桥,依靠中美双方哲学传统的高度协调,正像复旦早期的个案研究所表明的那样。

#### 参考文献

- [1]Zhu Weizheng, "Statesman and Centenarian: Ma Xiangbo as Witness of China's early Modernity," In Ma Xiangb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eds. R. Hayhoe and Y. Lu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6), 13-88.
- [2]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年,第 209 页。
- [3]Lu Yongling, "Standing Between Two Worlds: Ma Xiangbo'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Ma Xiangb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eds. R. Hayhoe and Y. Lu, 160.
- [4]Lu, "Standing between Two Worlds,"161.
- [5]蔡元培:《蔡元培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3-25 页。
- [6]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年,第 41 页。
- [7]《蔡元培选集》,第 291 页。
- [8]Eugene Lubot, "Ts'ai Yuan-p'ei: From Confucian Scholar to Chancellor of Peking University," unpublished Ph.D. thesis,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70, 64-75.
- [9]《蔡元培选集》,第 98 页。关于蔡元培辞职的讨论,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第 79 页。另参见 Lubot, "Ts'ai Yuan-p'ei," 96-97.
- [10]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第 32 页。
- [11]R. Hayhoe, "Towards the Forging of a Chinese University Ethos: Zhendan and Fudan, 1903-1919," China Quarterly, 94 (June, 1983) 331-332.
- [12]章益《李登辉》,见《中国教育家传略》(内部发行),四平师范学院,1981 年 10 月,第 22-23 页。1982 年 3 月,我去山东济南访问章益,为了纪念他的老师,他把《李登辉》手稿复印件交给我。
- [13]George Wilson Pierson, Yale College: An Educational History 1871-1921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65.
- [14]Pierson, Yale College, 72-94.
- [15]Pierson, Yale College, 87.据说,德怀特曾说过,班级系统是“大学生活中最强大的教育力量之一”。
- [16]Pierson, Yale College, 85.
- [17]Pierson, Yale College, 8.
- [18]Pierson, Yale College.
- [19]1919 年,李登辉被基督教会圣约翰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Who's Who in China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April, 1931), 247.
- [20]章益《李登辉》,见《中国教育家传略》(内部发行),四平师范学院,1981 年 10 月,第 24 页。
- [21]章益《李登辉》;吴道存致笔者的信,1982 年 9 月 23 日。
- [22]《复旦大学志》第 1 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93 页。
- [23]《复旦大学志》第 1 卷,1985 年,第 93-97 页。
- [24]H.G.W. Woodhead, ed., The China Yearbook (Tientsin: The Tien Tsin Press Ltd., 1928), 502-502. H.G. W. Woodhead, ed., The China Yearbook (Shanghai: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 Ltd., 1938), 317.
- [25]李权时:《复旦商科历年概况及今后计划》,1926 年《复旦年鉴》,第 136 页。
- [26]郭任远:《心理学与遗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年。书中刊登了他在美国《心理学评论》、《比较心理学研究》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 [27]《复旦周刊》(原文出处不详——译者注)。
- [28]张志让早年是复旦毕业生,后去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法律,回国后除从事法律实践外,还担任复旦教授、法学院院长。要详细了解张志让的职业生涯,见 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6), 13-14.孙寒冰曾任复旦政治系主任,因主编《文摘》而闻名。《文摘》是著名的进步出版物,抗日战争期间影响极广。1940 年夏,孙死于日机轰炸。
- [29]《复旦大学志》第 1 卷,第 304-370 页,详细说明了复旦系科的发展,并附有许多原始文件。
- [30]萧超然:《北京大学校史》第 41 页。
- [31]John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23-24.
- [32]章益采访录。1982 年 3 月,笔者去山东济南山东师范学院采访了章益。
- [33]吴道存在 1982 年致笔者的信中,认为该杂志的立场是反对法西斯、争取世界和平,还提到该杂志首次把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译成中文。
- [34]1920 年《复旦年刊》详细介绍了薛仙舟的合作运动计划。
- [35]《复旦年鉴》,1926 年 7 月,第 12 页。人们可以想象,德怀特校长 1890 年代在耶鲁作过类似的演讲。
- [36]"Ts'ai Yuan -p'ei's policy for Peking University," in John Fairbank and Teng Ssu-yu,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38-239.



- [37]1936 年 9 月 28 日,李登辉的辞职信向复旦师生公示。吴道存在 1982 年致笔者的信中对此作了如下解释:“复旦是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成了反动政府的眼中刺,当局起初想买李登辉,请他当立法委员,但是这个企图失败了。最后当局决定迫使他辞职。1936 年,李登辉最终辞职。”
- [38]吴道存曾长期担任李登辉的秘书,1982 年在致笔者的信中对当时的情形作了描述:“要理解复旦,必须从两个阶级的斗争中来看——解放前,两种力量的斗争是很尖锐的”。
- [39]《复旦大学校刊》第 116 期,1931 年 9 月 5 日。
- [40]韦振寰(音译)《我们要维持学术的风气》,《复旦大学校刊》第 124 期,1932 年 10 月 17 日。
- [41]凌宏基(音译)等《读了“我们要维持学术的风气”以后》,《复旦大学校刊》第 125 期,1932 年 10 月 24 日。
- [42]R. Hofstadter and W. Smith,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Vol. II,874.
- [43]Richard Hofstadter and Walter Metzger,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 [4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资料》第 2 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年,第 646-647 页。
- [45]陈青之:《中国教育史》第 2 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756-758 页。Linden, Alle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Case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1927-1928"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VIII, No. 4, August, 1968, 763-776.
- [46]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23-24.
- [47]Lu Yongling, "Standing Between Two Worlds," 178-191.
- [48]周予同:《中国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 年,第 201-202 页。
- [49]周予同:《中国教育史》,第 31 页。
- [50]周予同:《中国教育史》,第 223-225 页。
- [51]周予同:《中国教育史》,第 209-210 页。
- [52]周予同:《中国教育史》,第 202 页。
- [53]《中国教育年鉴》第一部分,上海:开明书店,1934 年,第 16 页。
- [54]《教育法令》,上海:中国书局,1947 年,第 141、144 页。
- [55]《大学规程》条款 1-2,《大学组织法》条款 4-5,见《教育法令》,第 141-142 页。
- [56]Becker, C.H., Falski, M., Langevin, P. and Tawney, R., *The Reorganis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Paris: League of Nations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1932), 25.
- [57]Becker et al, *The Reorganis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28.
- [58]Ernst Neugebauer, *Anf?nge p?dagogischer Entwicklungshilfe unter dem V?lkerbund in China 1931 bis 1935* (Hamburg: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 1971), 183-184.
- [59]Stephen Duggan, *A Critique of the Repor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Mission of Educational Experts to China*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933), 23-24.
- [60]庄文庆(音译)《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之源流》,未出版的博士论文,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台湾历史研究所,1979 年,第 300 页;陈立夫《战时教育行政会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 年,第 317-325 页。
- [61]John Israel,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62]Ruth Hayhoe, "Lessons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in *Knowledge Across Cultures: A Contribution to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eds. R. Hayhoe and J. Pan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340.
- [63]Ruth Hayhoe, *China's Universities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Chapter 3, "The Socialist Story 1949-1978", 73-113.
- [64]Ruth Hayhoe,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the Open Door* (New York: M.E. Sharpe, 1989), Chapter 7.
- [65]Joseph Ben-David, *Centres of Learning*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7).
- [66]R. Hayhoe and J. Pan, "Introduction" in *Knowledge Across Cultures: A Contribution to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eds. R. Hayhoe and J. Pan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1-21.
- [67]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2).
- [68]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no. 3, 1993, 49.
- [69]Tu Wei-ming, "Beyond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in 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Berthrong,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14.
- [70]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99), 12.
- [71]Hall and Ames, *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77.
- [72]Hall and Ames, *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69.
- [73]Hall and Ames, *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137.
- [74]Hall and Ames, *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152.
- [75]Robert Neville, *Boston Confucianism: Portable Tradition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12.
- [76]Neville, *Boston Confucianism*, 95.
- [77]Bruce Wilshire, *The Moral Collapse of the University: Professionalism, Purity and Alien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Mark Schwehn, *Exiles from Eden: Religion and the Academic Life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责任编辑:治文)

收稿日期 2005-08-25

作者简介:许美德(Ruth W. Hayhoe),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OISE/UT)教授,国际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